

# 从文艺的大众化到文艺的精品化

——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价值演变逻辑 □范玉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艺是文化的核心，并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回望历史，文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指出的，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在党的早期工作中，一切以革命为中心，文艺扮演了启蒙大众、动员大众，号召民众起来推翻压在头顶的“三座大山”号角的角色，文艺大众化是党的早期工作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延安文艺道路”的全过程，文艺为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鼓舞与呼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年代，政治是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神经，文艺同样体现了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策导向，涌现出一大批“红色经典”作品，彰显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激情。改革开放时期，文艺在回归自身本主中发出了思想解放的先声，追求审美自律、艺术自由，开启了文艺探索、实验文艺竞相绽放的新时期，成就了文艺创作的多元化格局。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高扬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追求，文艺正在为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贡献独特的声响和色彩，为坚定文化自信发挥重要的支撑力量。

## 文艺创作的大众化追求

在党的早期工作中，文艺是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等非常重视文艺大众化工作，党领导下的左联，更是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文艺大众化旨在实现以文艺化大众，把文艺视为启蒙大众、动员大众的有力工具，重在发挥文艺的教化作用，特别是发挥文艺的阶级意识，强化文艺要服务于从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

1930年3月2日，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议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以《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题的讲话，提出“工农大众”而进行文艺创作的基本目的。左联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作为领导人之一的鲁迅倡导文艺创作应该“竭力来作浅显易懂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1931年，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文艺大众化的创作追求与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密切相关，旨在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起来革命，文艺追求创作之外的目的，使其把目光投向了亟待启蒙的大众——革命的潜在力量。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定性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第一次鲜明地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上的讲话中明确了党的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政策，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文艺的工作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泽东的回答是，“现在工农兵前面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

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革命的形式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要求文艺首要的任务是普及，承接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传统，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内容更加丰富，民族危亡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外侮，文艺的大众动员——鼓舞人心的作用空前凸显。

在党的早期工作中，文艺大众化旨在把文艺视为时代的号角，促使它以最生动、最丰富、最立体的镜像向着时代主题聚焦，以文艺的方式回应时代之问。斯时，为着中国革命的成功、为着民族的解放，文艺必须尽最大可能动员启蒙群众，以新思想新意识唤醒民众，发挥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刺向敌人的胸膛，点亮国民精神的灯火。因而，文艺创作要大众化，在文艺普及中以新思想武装大众，唤醒大众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为着建设一个新中国而激发全社会全民族的战斗意志。与当时广大民众基本上是文盲半文盲的状态相适应，启蒙之梦，使之成为觉醒的中国人。因此，文艺创作要尽可能地与民众打成一片，成为他们能够看得懂、听明白的启蒙之物，文艺的大众化就成了时代的文艺追求，党的早期文艺工作就围绕文艺的大众化追求展开。文艺的这种创作导向一直延续贯穿在“延安文艺道路”中，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五亿农民的“新农民画”“新电影”等艺术创作中仍有其余绪。

## 文艺创作的精品化诉求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不同于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文艺普及的大众化追求，在人民的物质需求显著改善和提高下，人民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欣赏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越来越丰富而且要求越来越高，文艺创作的精品化诉求，成了时代的最强音。面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史诗般的伟大实践，文艺不能迷失前进的方向，更不能降格以求，而是向着艺术高峰攀登，向着世界舞台上的高势能文化迈进。当今时代，全球化舞台上的文化博弈往往显现为精品之争，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需要高扬社会主义旗帜。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时代的万千气象，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正在展现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必然诉求文艺的精品化创作。“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因此，新时代文艺精品有效供给必然要求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精品化诉求中实现当代文艺的经典化。优秀作品的不不断涌现是时代之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郑景康 摄

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思想价值的感召力与文明的相互通约，是文艺对新时代声音的倾听，并向着时代主题的再次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具体到文艺的精品化诉求，就是尊重文艺自身的创作规律，坚持文艺自律和审美理念、艺术的卓越性追求，把文艺发展置于文化建设的中心，从而形成文化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的格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精神奠基的作用。

## 以文艺繁荣发展托举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21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同于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是文明型崛起之路，它必将以文化和精神的伟大为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做更大的贡献。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斯认为，文学和艺术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不仅受到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同时，因为情感和想象的缘故，文学艺术可以表征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具体个人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感情和情绪。作为一种民族情绪的表达和生活方式理想的结晶，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文艺在新时代担负了重要的文化使命，要以繁荣发展托举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新时代吹响了文艺繁荣发展的集结号，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不乏激动人心的壮举和无数令人叹服的英雄故事，更有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有着乡村振兴和大湾区建设的宏伟蓝图，有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相信文艺繁荣的盛况和气势磅礴的伟大作品将不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将不辜负于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



# 论衡、重估与拓展

——凝眸《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 □张连义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论衡”收录的是茅盾研究的综合性论述，成果多，有价值的也多；而“重估”是对既有研究成果或认识的新评价，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材料不断出现，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不断介入，如此等等，都丰富或颠覆了既有的研究，这也是重估的意义。不过，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茅盾研究已经很成熟，新的认识也有一定难度，重估的要求就比较高，这也是收录此部分论文较少的原由。

“论衡”一词，源于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著作《论衡》，意为明辨学术是非，昌明学术真相，彰显学术乃天下公器之价值。这个栏目的学术论文遴选的是综合性茅盾研究的成果。如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的《上海的文学经验》将茅盾与张爱玲进行对比研究，以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叙事对比茅盾的宏大叙事，指出“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茅盾的左翼思想立场对他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影响，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在参与实际政治活动过程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政治活动经验的文学汲取。这样的忽略，影响到对茅盾的文学史研究往往偏向于政治立场的阐释，而淡化了对小说家茅盾的文学经验的考量。”杨扬的这种认识，无疑对一直以来关于茅盾作品文学性和政治性的复杂关系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阎浩岗在革命叙事研究领域有着诸多建树，其论文《茅盾与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以土地革命叙事的视角切入茅盾研究，关于茅盾作品中地主形象的阐释，无疑显示出作为知识分子的茅盾对现实的尊重，也从某种程度上稀释了大众对“政治茅盾”的固识。赵学勇、高亚茹的《茅盾“未完成”长篇小说探析》，葛飞的《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时代的读者趣味》，李菊明、谢慧聪的《传统文化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整合与提升——以茅盾早期作文与教师批语为例》，李玲的《茅盾社会进步视野下的妇女解放理论》，蔺春华的《论文本细读在茅盾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等，都大大拓展了茅盾研究的话题空间，带有全局的启发性。

“论衡”并不意味着中庸，恰恰彰显出突破。这种突破性

也体现在“重估”栏目。赵思运在论文《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中，以诗人的眼光对茅盾的诗歌翻译活动进行分析，得出茅盾在新文化运动立场中凸显译诗意图伦理导致他的诗歌翻译缺乏诗歌文体意识的结论。受佳宁的《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张雨晴的《左翼文化界的尴尬遭遇——以开明版〈茅盾选集〉为例》等，都带有鲜明的反思与重估眼光。“域外”栏目中裴亮、张雨晴的《竹内好的茅盾论》、曾嵘的《茅盾文学在日本——以〈子夜〉对堀田善卫（历史）的影响为例》、阿克萨娜·彼得罗夫娜·罗季奥诺娃的《论茅盾对苏联儿童文学的兴趣》、在比较文学视野中拓展了茅盾研究空间。吕周聚的《论茅盾与美国左翼文学之关系》则通过详细的论证阐释了茅盾与美国左翼之间的关系，并以此重新认识茅盾的成就及影响。

近年来，史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日益成为一种显学。最新史料的发现，更有利于形成新的观点或为既有观点增加论据，对茅盾研究大有裨益。本年鉴也体现出这方面的最新前沿性成果。钟桂松的《新发现的有关茅盾的几则史料》、雷超的《茅盾代理〈时事新报〉主笔史实及新发现的佚文考证》等6篇文章都是对茅盾研究史料的挖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鉴》遴选出被注意的非公开出版物的成果，如《梧桐影·致敬茅盾专辑》中夏春锦的《木心与茅盾》、《嘉兴文博》中陈杰的《茅盾父亲沈永锡逝世年份探究》等，这些论文的记录显示出编者对茅盾研究现状的深入把握和对最新研究的透彻了解，也为《年鉴》的权威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年鉴呈现出的茅盾研究队伍也令人激赏。我们既看到了钟桂松、杨扬、赵学勇、李继凯、高旭东、贾振勇、吕周聚等中间力量奉献的重要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受佳宁、雷超、裴亮、官立、赵丹、张雨晴、谢慧聪、高亚茹等一批年轻博士以及博士生、硕士生的富有锐气和学术功底成果。《茅盾研究年鉴》的亮点还体现在对硕士毕业论文的收录。实事求是地说，不少硕士生因为知识、经验、资料等等的基础较差，在研究

2020年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宣布将原隶属于文学门类中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独立学科门类的第十年。值此契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于6月2日举办了“艺术学升门十年：未来的展望”网络学术论坛，邀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和成员，共同回顾艺术学理论学科十年发展历程，畅谈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 认清学科现状，把握时代趋势

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升门后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其前身是作为理论学科的艺术学二级学科。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经历了一条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学术史路径。历时80余年，艺术学理论在不断修正与完善中从“潜学科”成为“显学科”，已得到整个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认同，具有完备和系统的评价体系。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艺术学理论学科已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6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3个、博士后流动站16个，从业专职师资约1000人，已经涵盖全科艺术院校及研究机构、单科艺术学校、理工科大学、综合大学及师范院校四种形态，初步形成了基础理论艺术学和应用理论艺术学两个学科系列。在人才培养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制定和实施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了核心课程体系。这些课程一方面着眼于夯实学科基础，强基固本；另一方面依托学位授权点学科环境需要并面向行业需求，拓展应用空间。

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还存在学科点多而不精、分布不均匀、专业期刊数量无法满足师生要求等问题。例如艺术学理论博士点在华南地区布局仍属空白，相比艺术学其他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艺术学理论还没有一个与这个学科相对应的专门期刊。这些都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起步时间晚、学科共识及认同度存在缺陷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王川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已初步长成为小树林，尚待未来长粗、长高、长大，直到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对于艺术学理论现状，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宪教授表示，艺术学理论学科总体还相对滞后，积累比较薄弱，学科影响比较小。虽然旗帜已经举起来了，队伍组起来，体制建起来，戏唱起来了，但是现在真的要思考这个学科未来。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还存在许多难题，尤其是这一学科在国外没有可以直接参照的经验和模式，国内许多共识还未达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艺术学理论学科正面临着重大的时代机遇。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王廷信教授认为，艺术学升门给艺术学理论学科搭建了更高级别的平台。无论是国家对艺术的重视、艺术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提升，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会给艺术学理论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现象与资源，从而推动高质量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成果的涌现。

## 加强理论研究，夯实学科基础

艺术学从原来的一级学科和八个二级学科的体系升格为门类学科后，设置了新的五个一级学科，包括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但是这样的归并是不可得已而为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更是长期面临着“名不正”“伪学科”等质疑或指责。

中国文联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艺术学已经完成了升格门类学科的使命，就应该避免艺术学内部的“名分”之争。他建议艺术学在面向未来的时候，要真正地向哲学思维层面出发，用一种兼容、整合、辩证、和谐的思维去取代过去长期羁绊的此非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然后实现美美与共、兼容整合。王川教授也建议，艺术学理论学术共同体要进一步增强学科的主体性，对内增强认同度，对外提高承认度，促进学科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集中精力加强学术研究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中能够担当起时代力作的著作仍然缺少，能够引领理论风尚的原创性学术观点不足，这是导致这一学科常常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专家们一致表示，艺术学升门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夯实基础，尤其要注重回归本位的研究，更加系统地凸显史、论、评理论的建构，争取在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学科核心领域取得更多原创及突破性重大的成果。这是事关学科生死存亡的大事，是站得住、行稳致远的关键。但是，我们也不宜急功近利，而是需要长期潜心研究，集中学术创造力去开拓和耕耘。

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十年，也是艺术学界不断探索、思考、实践的十年。往前追溯，更是几代学人艰苦卓绝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李心峰教授认为，当前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新阐释艺术学升门这一事件，不能仅仅将其视为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内部事件，而是要放在整个人文科学体系当中来看待，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科学版图和科学体系。

十年辛苦不寻常，繁枝叶茂待来年。随着学科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艺术学理论必将在培养精神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在下一个十年结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果实。

方面确实有着先天的不足，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多数硕士生的研究受到既有成果的影响较小，他们对问题的思考以及认识，也就缺少了羁绊，容易突破既有的研究视野和模式而呈现出发散性的思维，这也为茅盾研究新思路的开拓提供了条件。他们的兴趣、思想和认识基本上决定了未来茅盾研究的成就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硕士论文的选择无疑具有前瞻性。

《年鉴》的体例也具有灵活性及弹性，这鲜明地体现在论著和索引资料的处理上。《年鉴》在概括内容之外，又巧妙地选取了书评作为研究专著的评价，这样既可以了解专著的主要内容，又客观地呈现出专著在茅盾研究领域的突破和局限。钟桂松是桐乡人，也是茅盾研究专家，已经出版了多部茅盾研究专著，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是其茅盾研究的一力作。如此重要的作品，年鉴除了对专著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还收录了刘勇、张悦关于此书的书评，从而使读者对专著的主要内容、价值和意义有了直观的了解，很好地做到了年鉴要求的客观性。对于其他论著，《年鉴》也根据内容采取了适当的形式，力求客观地呈现出现。《抗战中的郭沫若与茅盾——郭沫若与茅盾展览纪实暨学术讨论集》是对研讨会的梳理和总结，《年鉴》对其背景、内容及意义进行概括性的介绍，显然借鉴了会议资料；《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则主要以论著目录的形式呈现；其他论著也都根据内容采取了适当的形式，而没有拘囿于一定的标准，显示出编者对材料的灵活处理。第四篇“索引”则按照期刊论文、报纸文章和硕士学位论文等载体分类，对其使用也是收录其内容摘要，尽量避免主观性的评价。资料处理的客观性，显示出编者对文章原作者的尊重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

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项烦琐而费时的的工作，需要对资料进行认真的研读和深入的分析，更需要研究者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在这浮躁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基础性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做，但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年鉴》的编者有着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着基础性的工作，并将其常态化，显示出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细致的学术品格。本质上说，《年鉴》是茅盾研究资料的年度汇编，也是后续茅盾研究的基础，对茅盾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d 借鉴意义，实在是一部具有权威性实用性的茅盾研究资料。

# 扎实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

□宗祖盼